

# 烽火连天，弦歌未辍

## ——教育部成立长沙临时大学给梅贻琦等密谕

▶ 金富军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中国人民伟大的全民族抗战开始。8月，位于平津的国立清华大学、国立北京大学和私立南开大学在长沙联合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1938年4月，长沙临时大学又迁至昆明，改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长沙临时大学与西南联合大学前后相继，与伟大的全面抗日战争相始终，三校师生和衷共济、弦歌不辍，创造了战时高等教育的奇迹，也铸就了教育史上不朽的丰碑。

卢沟桥事变爆发时，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与陈岱孙、浦薛凤、顾毓琇、庄前鼎等教授以及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等应邀参加于7月9日起在庐山召开的“各界知名人士国是问题谈话会”。

由于此前几年间，中日之间时有摩擦，所以“卢沟桥事变”后几天，各方均在仔细评估此次事变的严重性，社会局面尚显镇静。7月10日，清华大学教务长潘光旦、秘书长沈履联名致电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请急转梅贻琦，称“连日市民、学校均镇静。各方安，乞释念”。至14日，局势恶化，潘、沈二人急电梅贻琦：“和平望绝，战机已迫”，请梅贻琦设法绕道正太路、平绥路返校，应付时变。同时，潘光旦、沈履及清华大学数学系教授郑之藩等人联合北大等校教授密电在庐山与会的梅贻琦、胡适、蒋梦麟等人，希望他们劝谏蒋介石等国民党高层：“务请一致主张贯彻守土抗敌之决心，在日军未退出以前绝对停止折冲，以维国权。”

17日，梅贻琦密电潘光旦：当日早晨当局召开重要会议，表示坚决抗日，并已开始布置。梅贻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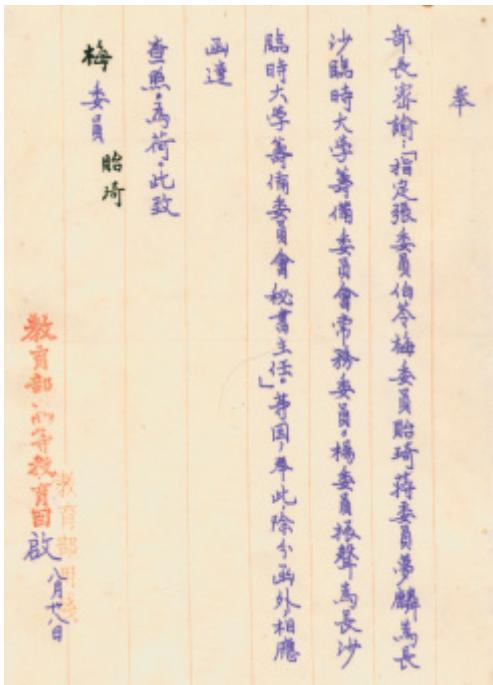
表示，与蒋梦麟商量后，不日即将返回。同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提出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完整等解决卢沟桥事件的四个条件，并致电宋哲元、秦德纯：“倭寇不重信义，一切条约皆不足为凭，勿受其欺为要。”同日，东京日本五相会议决定，动员40万日军侵华，华北局势急转直下。29日，北平沦陷。

当时，正值暑假，清华大学一、二、三年级学生在北平西郊妙峰山一带夏令营作军事演习，土木系大部分学生在山东济宁县实习，四年级毕业生有200余人留校找工作，准备研究生与留美公费生考试。教职员大部分都在校内。

8月，北平沦陷后，清华留校师生及家眷纷纷撤向城内。此时校内人心不稳，校内师生对局势议论纷纷。14日晚，沈履、潘光旦等在工字厅召集通气会，通报连日与北平市长秦德纯沟通情况，通报日军决意发动侵华战争吞并华北，大战在即，29军决意抗战等情况。15日，清华提前发给教职员七月份工资，以为预备。

8月14日，教育部决定清华、北大、南开三校迁至长沙组建临时大学，致函电告仍在庐山的梅贻琦，请其与顾毓琇出席19日在南京召开的筹备委员会预备会。17日，梅贻琦收到函电。翌日，梅、顾致函电给在南京的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主任庄前鼎，请其代为出席预备会，并电示会议结果。同日，二人还回复教育部次长周炳琳解释原因。

梅贻琦下庐山后，即刻北返。行至南京后，由于平津交通中断，无法北上。滞留南京期间，梅贻



教育部任命长沙临时大学负责人的密谕

琦除了积极向南京各方探听消息外，只能依靠函电与学校保持联系。梅贻琦始终放心不下学校与师生，肝肠“一回而九折”。1939年4月，梅贻琦回忆：

斯时也，琦已由庐山到京，因平津交通中断，无法北上，除与校中同人函电商外，日惟向京中各方探取消息，每闻及沙河激战，西苑被炸，念我介乎其间之清华校园，不知被破坏至何程度矣。某日报中载有清华学生二百余人在门头沟附近被敌人屠杀，更为焦急。凡兹传闻，虽事后幸未证实，然在当日闻之者，实肠一回而九折也。

8月28日，教育部密谕：

奉部长密谕：“指定张委员伯苓梅委员贻琦蒋委员梦麟为长沙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常务委员。杨委员振声为长沙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秘书主任。”等因；奉此，除分函外，相应函达

查照，为荷。此致

梅委员贻琦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启

八月廿八日

9月初，清华在长沙成立办事处。9月11日，梅贻琦自南京抵达长沙，参加筹备临时大学工作。在天津、南京、上海、汉口四处清华同学会的协助下，办理通知清华南下师生职员到长沙开学等事宜。

清华南迁的决策，固然有国民政府的决定，清华校内也有共识。冯友兰回忆：

北京不守，本来早就在人们的意料之中。应变的计划，清华早已有了准备，几年之前，已经着手在长沙设立分校，并动工在长沙岳麓山建筑校舍，图书馆的图书，已经陆续运到长沙，已经决定在新校舍建成后，把几个研究所先行搬去。所以此时对于全校南迁没有多的讨论、争执就决定了。实际上除此之外，也没有别的路可走。

经过紧张高效的筹备，仅用不到两个月时间，长沙临时大学便筹备完毕，三校师生克服重重困难赶赴长沙。临时大学原定10月10日开学，因时间过于紧迫，虽迁延至10月25日开学，11月1日上课。即使如此，仍有很多师生未能按时赶到长沙。11月17日，长沙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向教育部工作报告书统计：临时大学理、法商、工学院租用长沙韭菜园圣经学校，文学院租用南岳圣经学院，同时分别租用四十九标、涵德女校作为男、女生宿舍。临时大学自始即用归并办法，三校共有院系、一校内性质相近院系均予以归并以节省开支，提高效率，归并后设4个学院17个学系。教员148人，其中清华73人，北大55人，南开20人。截止到11月20日，三校原有学生到校1120人，其中清华631人，北大342人，南开学生147人；此外，新招学生114人、借读生218人；全校学生总计1452人。此外，经费、建筑设备、行政组织、教学设施也都初具规模。

梅贻琦曾说“自北平沦陷，战祸延长，我政府教育当局，爰于八月中命本校与北大、南开合组临时大学于湖南省会之长沙，琦于八月底赴湘筹备，……烽火连天，弦歌未辍，虽校舍局促，设备缺乏，然仓卒得此，亦属幸事。”实际上，从开始筹备到



▲湘黔滇旅行团标识

◀长沙临时大学旧址：湖南圣经学校旧照

开学不足两月，这已不仅是“幸事”，而是奇迹了。陈雪屏评价：

长沙临大真是名副其实的“临时”大学，一切都是草创急就，由于中央和地方教育当局的指导和协助，再加上三所大学负责人的努力，竟能在一个月的短时间内，创立规模，奠定基础，像其他尚未直接罹难的学校一样，按照通例，准时开学上课。简直可说是一个“奇迹”。其间经历的困苦和艰辛，是难以文字叙述的。

三校联合，校务纷繁复杂。当务之急是建立联合大学领导机构，尤其是主要负责人员。在长沙临时大学时期，校务由三校校长与教育部代表共同组成委员会负责。后来迁至昆明后，则由三校校长组成常委会负责，教育部不再派代表。

主要领导人的选择是考验三校的大事。北京大学蒋梦麟、周炳琳、胡适等推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总负责，张伯苓不在长沙时则由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负责。8月30日，胡适致函张伯苓、梅贻琦。信中写到：

孟邻兄有信与枚荪兄和我。他说，临时大学实行时，“虽职务各有分配，而运用应有中心。伯苓先生老成持重，经验毅力为吾人所钦佩，应请主持一切。”孟邻兄此意出于十分诚意，我所深知。我们也都赞成此意。所以我把此意转达两公，付两公以大事为重，体恤孟邻兄此意，不要客气，决定推

伯苓先生为对内对外负责的领袖，倘有伯苓先生不能亲到长沙之时，则由月涵兄代表。如此则责任有归，组织较易进行。千万请两公考虑。

揆诸实际，查长沙临时大学常务委员会57次会议、58次会议记录（第14次出现两次会议记录），其中有7次没有出席者签名；在有出席者签名的51次会议记录中，梅贻琦出席46次，潘光旦代理出席3次；蒋梦麟出席36次，樊际昌代理2次；张伯苓出席7次，黄钰生代理35次。可见，在长沙临时大学筹备及开学期间，梅贻琦、蒋梦麟起实际领导作用。

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先生也曾回顾这段历史：

我到达长沙时，清华大学的梅贻琦校长已经先到那里。在动乱时期主持一个大学本来就是头痛的事，在战时主持大学校务自然更难，尤其是要三个个性不同历史各异的大学共同生活，而且三校各有思想不同的教授们，各人有各人的意见。我一面为战局担忧，一面又为战区里或沦陷区里的亲戚朋友担心，我的身体就有点支持不住了。“头痛”不过是一种比喻的说法，但是真正的胃病可使我的精神和体力大受影响。虽然胃病时发，我仍勉强打起精神和梅校长共同负起责任来，幸靠同人的和衷共济，我们才把这条由混杂水手操纵的危舟渡过惊涛骇浪。

临时大学初期，清华计划利用原来在长沙岳麓



1938年湘黔滇旅行团的辅导老师合影

山南为特种研究所修的建筑，做暂时驻扎的打算。讵料12月13日首都南京即沦陷。武汉危急，战火逼近长沙。学校何去何从？成为临时大学领导必须回答问题，经过艰难决策，长沙临时大学被迫再度迁校至昆明。正如西南联大校歌中吟唱的“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

到昆明后，1938年4月2日，教育部以命令转知：奉行政院命令，并经国防最高会议通过，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6月8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关防”到校，7月1日正式启用。校名中不再出现“临时”，这表明政府意识到了抗战的长期性。

1938年12月21日，西南联大第98次常务委员会会议明确规定：“自本学年起，本校常务委员[会]主席任期定为一年，由清华、北大、南开三校校长按年轮值。本学年本会主席应请由梅贻琦先生担任。”但实际上并没有轮流主持，三校和衷共济，蒋梦麟、张伯苓谦逊克己，联大校务始终由梅贻琦主持。

陈雪屏指出，长沙临时大学时期，“前线军情紧急，后方日夜空袭，然后临大的师生艰苦卓绝，固守岗位，仍然是‘弦歌之声不绝’。对于镇定人心，增强‘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的信念，起了极大的作用。这种不屈不挠的精神，充分表现了中国学人

的德性，更象征着中华民族的伟大。”这种精神，一直贯穿于西南联大始终。正如1945年“在长沙时间，虽然只有几个月，但在这几个月中创下了联大的精神，也奠定了联大这个战时学校的基础。”

实际上，抗战全面爆发，虽有教育部训令和梅贻琦等领导下高效的筹备工作，但始终存在三校能否联合、临时大学能维持多久的疑虑。陈序经回忆：

我到长沙的时候，因为筹备“临大”的负责人还尚未到长沙，我因为在旅馆住的不便，乃到湖南教育厅问朱经农先生，我能否搬入长沙圣经学校居住。朱先生告诉我道：“圣经学校虽已商定为‘临大’校址，可是‘临大’能否成立，还是一个问题。”……

我要指出，在那个时候，不只朱先生不能预料临大能否成立，就是一般的教育界的人士，以至北京、清华与南开这三个大学的同人，也很怀疑“临大”的能够成立。因为这三个大学，不只因为历史、环境、学风都有不同之处，而且因为经费上的支配，课程上的分配，以及其他的好多问题，并不容易解决。……

南京失守以后，长沙人心惶惶，这个时候，教育部的主管当局也有更动。外间传说“临大”就要解散，然而事实上，所谓临时大学的“临时”性质，反而改为比较永久的学府。我们从湖南迁到云南，我们的长沙临时大学，遂改为西南联合大学。

正是梅贻琦等人卓有成效的领导和三校的精诚合作，打消了各方的疑虑。

长沙临时大学与西南联合大学“此一段非常时期之教育工作，最为艰苦，最费心力。”在最艰苦、最费心力的时期和岗位上，梅贻琦也继续其在清华谦逊、民主、务实的领导风范，深得西南联大师生拥戴，与蒋梦麟、张伯苓等一起带领西南联大走过风雨如晦的艰难岁月，迎来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